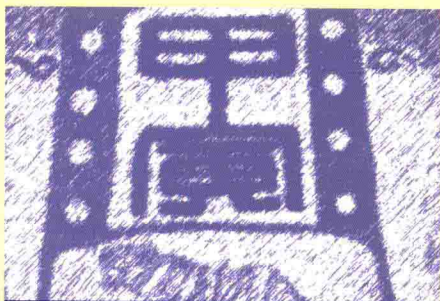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民国研究丛书



『甲寅派』

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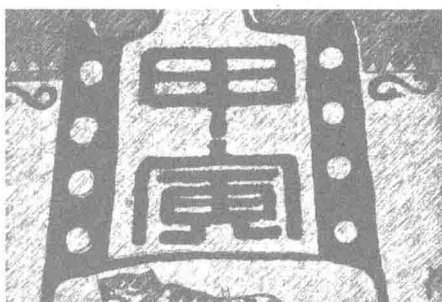
郭双林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民国研究丛书



『甲寅派』

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

郭双林 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贺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郭双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中国人民大学民国研究丛书/郭双林主编)

ISBN 978-7-01-014845-8

I. ①甲… II. ①郭… III. ①甲寅派-关系-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②甲寅派-关系-文化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9.5
②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9894 号

“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

JIAYINPAI YU XIANDAI ZHONGGUO SHEHUI WENHUA SICHAO

郭双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370 千字

ISBN 978-7-01-014845-8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一、近代社会思潮的基本格局与“甲寅派”的政治文化属性	1
二、“甲寅派”研究现状	5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及资料使用情况	30
第一章 章士钊与“甲寅派”	33
一、章士钊其人	33
二、《甲寅》与“甲寅派”	56
第二章 前期“甲寅派”的“政治调和论”及其思想渊源	96
一、前期“甲寅派”成员对调和概念的不同理解	96
二、“政治调和论”的主要内容	109
三、“政治调和论”的思想来源与论说对象	118
第三章 与新思潮阵营的“新旧调和”之争	135
一、“新旧调和论”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135
二、新思潮阵营对“新旧调和论”的批评	156
三、论争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169

第四章 后期“甲寅派”的“以农立国论”	194
一、“以农立国论”的提出	194
二、何谓“以农立国”	198
三、作为一项政策的“以农立国论”	218
四、进步思想家对“以农立国论”的批评	227
第五章 对代议制的批评与改造	240
一、章士钊对代议制的批评	242
二、改造方案之一——无首论	250
三、改造方案之二——业治论	255
四、改造方案之三——恢复科举制	263
五、改造方案之四——规复科道制	270
六、围绕代议制批评和改造方案的讨论	277
第六章 与新文学阵营的“文白”之争	307
一、后期“甲寅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308
二、新文学阵营的反击	323
三、后期“甲寅派”的回应	335
四、新文学阵营的第二次反击	349
第七章 “整顿学风”与改革教育	360
一、走马上任与《整顿学风令》的颁布	360
二、五七学潮与“整顿学风”受阻	365
三、东大易长风潮与“整顿学风”再次受阻	374
四、女师风潮与“整顿学风”的失败	385
五、章士钊的其他教改措施	396

结束语.....	426
----------	-----

主要参考文献.....	429
-------------	-----

后 记.....	439
----------	-----

绪 论

一、近代社会思潮的基本格局与 “甲寅派”的政治文化属性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动，激进主义成为人们讨伐的对象，而“激进——保守”这一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也逐渐成为许多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范式”之一。有的人甚至在没有进行深入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便悍然宣称：“近现代中国不乏迷恋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乏推崇现状的政治保守派、复古的顽固派，不乏尚古的恋旧主义者、文化守成主义者，但直到近来，中国都未曾出现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者，崇尚自由的保守主义者。”^①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第三种力量在，这就是时下人们所说的“调和”思潮。从清末的杜亚泉，到民国初年的章士钊，均曾秉持这一主张。于是，近代社会思潮的基本格局，就不再是“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而呈“激进——调和——保守”的三足鼎立之势。^②对柏克，不仅清末章士钊就曾运

① 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4—255 页。

② 王尔敏在《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一文中就从保守、进取与调和三方面论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发展动向，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1 页。

用其理论来指导立宪运动^①，而且终其一生，尽管在文化上回归传统，但在政治上始终没有越出自由主义的边界。因此，说近代以来中国未曾出现“崇尚自由的保守主义者”，似尚缺乏进一步的论证。

当然，“激进——调和——保守”只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三个大致走向或基本格局，具体到不同时期，哪种思潮或思想主张属于激进、保守抑或是调和，则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余英时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任何值得维持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保守主义很难有什么立足点。”^②在这里，余英时用了“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在同一文中他对自己所说的“保守主义”进行了界定，即并不是指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而是指一种倾向、一种态度，也就是说，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保守。好在他做了这么一个界定，否则其演讲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因为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本来就非常不发达，遑论自由主义内部的保守倾向。事实上，在近代中国，不仅余英时所说的保守主义没有一个立足点，即使是激进主义和调和主义也同样没有一个立足点。由于社会在急剧变迁，每一种政治力量、每一种社会思潮都在发生变化；不仅其内部在发生变化，其外在的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具体到社会思潮的格局，从清末到民国，至少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变化，而每一次变化又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密切相关。

第一次是庚子事变。在此之前，至少存在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三种政治势力。相应地，也存在维新思潮、洋务思潮和保守思潮三股社会思潮。如果一定要分出个左、中、右的话，那么维新思潮在当时属于激进主义，洋务思潮属于调和主义，而以倭仁、王先谦、叶德

① 参见郭双林：《在立宪与革命之间——试论武昌起义前后章士钊的政治思想》，《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②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辉等为代表、以反洋务、反维新为主要内容的这一社会思潮，应该属于保守主义行列。义和团运动，从广大民众的角度看，属于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保守势力而言，则是一场反攻倒算。它反对的不仅是维新运动，也包括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列强压迫下一次又一次的惩凶，使清政府内的顽固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那些曾经支持或利用义和团“灭洋”的旧派人物，或被杀头或被流放，未被杀头或流放的，也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清政府内部的顽固势力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901年开始的新政，使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重新得势，从此以后，中国政治势力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变化。如果也按左、中、右划分的话，可以说，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属激进派，以张謇、梁启超等为首的立宪派属调和派，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假立宪派（或洋务派）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可称之为保守派。与此相适应，民主革命思潮、立宪思潮和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假立宪思潮是当时存在的三股社会思潮。

1911年的武昌起义赶走了皇帝，却无力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政治格局。当然也不能说这场革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保守势力方面，载沣换成了袁世凯，激进势力方面，以黄兴为代表的部分革命党人游离出来。至于原来的立宪派，仅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不仅政治倾向没有太大的变化，连人员构成也变化不大。所以就政治势力看，从原来的三派变成了四派，即革命党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派、以黄兴为代表的缓进派、立宪党人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缓进派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守旧派，但从总体上来说仍是三大政治势力，即激进、调和与保守。反映到社会思潮方面，仍然是激进、调和与保守三足鼎立。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基本政治格局。同样，在社会思潮方面，虽然新思潮不断涌动，但大致的格局仍没有根本改变。

真正改变这一格局的是北伐战争。北伐战争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东北“易帜”通电，前后只有两年五个月零九天，如果再除去国民党发动的旨在消灭共产党的所谓“清党”事件上所花费的时间，以及从宁汉分离到宁汉合流的内部协调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一年多时间。然而就是这一年多时间的北伐战争，对中国近代政治史乃至思想史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就政治格局看，这场战争把自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北洋军阀^①赶下了台。长期以来依附于这一政治势力的部分知识分子也随之发生分化——一部分与国民政府合作，一部分转向共产党，一部分到上海做起了寓公，也有一些人20世纪30年代后进入伪满洲国当起了汉奸。由于国民党企图独占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进行所谓的“清党”，迫使共产党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制造其执政的合法性依据，有意推行一些本土化文化政策，使本来都是激进势力的国共两党，成为激进与保守的两极，其他自由主义者则成为中间势力。就社会思潮的格局看，马克思主义和国民党的新保守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代表激进与保守势力的两股思潮，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是中间或调和力量。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大陆。

因此，无论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抑或是调和主义，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们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边界。需要指出的是，在大的社会思潮内包括不同的思想倾向、主张或流派，这些思想倾向、主张或流派也可用左、中、右来划分。激进主义思潮内部如此，保守主义和调和主义内部也不例外。

本书研究的对象“甲寅派”，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主义范畴，而且

① 这一势力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洋务派集团。

主要以 19 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为其“底”色，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精英主义特征。在文化上，前期属于调和主义，后期则属于文化保守主义。

二、“甲寅派”研究现状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甲寅派”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不了解前期“甲寅派”，便无法了解民国初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无法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不了解后期“甲寅派”，更无法知道新文化运动后期所面临的对手。“甲寅派”因《甲寅》^①而得名，《甲寅》则因章士钊而名扬海内外。这里所说的“名”，既有正面意义的，也有负面意义的。换句话说，章士钊因《甲寅月刊》而誉满天下，也因《甲寅周刊》而谤满天下，正可谓成也《甲寅》，毁也《甲寅》。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无论是对“甲寅派”、《甲寅》或是章士钊，都极为冷淡，更缺乏客观系统的深入研究，以至出现许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近年以来，围绕章士钊的研究陡然“热”起来，但对“甲寅派”和《甲寅》的研究，依然显得比较冷清，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单篇论文，但至今尚未见到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为了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关于“甲寅派”的研究状况，下面分《甲寅》和“甲寅派”研究、章士钊研究和“甲寅派”其他成员研究三部分，依次做一回顾。

① 包括《甲寅月刊》、《甲寅日刊》和《甲寅周刊》三种。当时人们习惯称《甲寅月刊》为《甲寅杂志》或《甲寅》。为避免误解，本书除引文保留原称谓外，以《甲寅》泛称章士钊所办的这三种报刊，以《甲寅月刊》、《甲寅日刊》或《甲寅周刊》来指称每一种具体报刊。

（一）关于《甲寅》和“甲寅派”研究

章士钊一生办过许多杂志，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甲寅》。一般来说，《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和态度基本一致，而《甲寅周刊》在思想倾向方面则明显不同。

到目前为止，研究章士钊的论著不少，但专门研究《甲寅》的论著并不多。就笔者所知，首先把《甲寅月刊》放到历史上来进行评判的是胡适。1923年12月19日，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的胡适在给高一涵等人的信中写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和《甲寅》还算不上。”^①胡适在这里的本意是说要把《努力周报》办成《新青年》的续篇，无意间却给《甲寅月刊》来了一个历史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这封信中还间接地涉及到《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的关系。事实上，在胡适之前，就有许多人把《新青年》看成了《甲寅月刊》的续篇。如《新青年》第2卷第1号刊登的一封来信中就说：“大志实代《甲寅》而作”^②。第3卷第3号上刊登的一封来信也认为：“续《甲寅》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③。不过，真正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二者关系的，是曾经投函《新青年》的常乃惠^④。1922年，常乃惠在其所著的《中国思想小史》中指出，培

① 《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第75期增刊第1版，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本。

② 《通信——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③ 《通信——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潜》，《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7年5月1日。

④ 常乃惠（1898—1947），字燕生，山西榆次人。曾就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先后主办《醒狮》、《中国日报》等，是中国青年党的骨干人物。著有《全民教育论发凡》、《社会学要旨》、《中国史鸟瞰》、《中国文化小史》、《中国思想小史》、《中国政治制度小史》、《生物史观研究》等。

育新文化运动种子的人既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当民国四、五年的时代，中国思想界的闭塞沉郁真是无以复加。……到章士钊在日本办的《甲寅杂志》出版以后，思想界才另有开了一条新路。”在他看来，《甲寅月刊》虽然也是谈政治的刊物，但其所谈的政治和当时其他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常乃惠指出，当时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已经主张抛弃政治，专从社会改造入手，章士钊在《甲寅月刊》上驳斥梁启超的议论，仍主张注意政治。后来的文化运动是跟着梁启超的主张走的，章士钊的主张似乎失败了。但是，梁启超虽然主张从社会入手，却没有给后来的文化运动指出新路，章士钊虽然并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但他无意间却替后来的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具体来说就是“理想的鼓吹”、“逻辑式的文章”、“注意文学小说”、“正确的翻译”、“通信式的讨论”，其中除第二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未能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申其序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扬光大的，“故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①。应该说，常乃惠的观点是明确的，论证也是比较充分的，但或许是由于后来章士钊走向所谓的“反动”，或许是因为常乃惠后来加入了青年党，总之，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如1936年郭湛波在所写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对《甲寅月刊》根本未予涉及。

1939年张君勱在为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作的序中，将《甲寅月刊》时期的章士钊比之于隐解《庄子》、开创魏晋玄学之风的向秀：“《晋书·向秀传》曰：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吾以为行严先生之性格，清悟远识，又何殊向

^① 常乃惠：《中国思想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179—181页。

秀？其传播欧洲学说，能发明奇趣，使读者超然心悟，又何殊向秀？即其文格言之，岂不直追魏晋，而与时代下文章之粗厉鄙俗者，何可同日语哉！”^①但这一提法似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20 世纪 60 年代，海外学者周策纵在其所著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曾指出，许多《新青年》的撰稿作家，如李大钊和高一涵，都曾为当时被查禁了的《甲寅月刊》投过稿。^②后来郭廷以也认为：“《甲寅杂志》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河，《青年杂志》或《新青年》则为主流和急先锋。”^③这一看法与常乃惠的观点非常相似。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大陆学者很难了解到这一研究状况，即使了解也很难接受这种观点。当时大陆出版的许多近代史著作，甚至是一些大部头的权威性著作，在叙述民国初年的历史时，都尽可能不去涉及《甲寅月刊》。如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下卷在叙述反对洪宪帝制的斗争时，对《甲寅月刊》只字未提。相反，倒是一些回忆性著作和专题文章，对《甲寅月刊》着墨较多。如 1983 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汪原放撰写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就分专章介绍了亚东书局出版《甲寅月刊》的情况。

之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198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4 集，收有白吉庵撰写的《甲寅》一文，对《甲寅月刊》创刊的时间、地点、内容、栏目、编辑队伍、编辑宗旨作了说明，并对其主要内容作了介绍和评价。198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在介绍黄兴与欧事研究会时，把《甲寅月刊》作为欧事研究会的“喉舌”作了简要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围绕《甲寅月刊》的研究出现某

① 张君勱：《〈逻辑指要〉序》，章士钊：《逻辑指要》，时代精神社 1943 年版。

② [美]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欧阳哲生等译，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第 61 页。

③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9 页。

些转机。当时关注的焦点是《甲寅月刊》和《新青年》的关系。1989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岳升阳在《〈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的理论准备》^①一文中,从人权说、国家观、功利主义思想和自我意识四个方面考察了《甲寅月刊》和《新青年》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甲寅月刊》不仅在组织上同《新青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思想上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新青年》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甲寅月刊》中找到它的原型。

1997年,香港学者陈万雄在其出版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通过对《新青年》及其作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统思想和清末民初的文学革新运动进行考察后指出:“无论从人物谱系和文化思想层面,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条理”^②。具体到《甲寅月刊》和《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陈万雄指出:“过往,或因主编章士钊在五四时期被目为文化思想保守派,忽略了《甲寅杂志》之在近代文化史上的价值。……《新青年》早期的大部分作者,大都是前此《甲寅杂志》的编者和作者。就这一点,已可窥睹两种杂志承传关系。”^③

1999年,朱成甲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中也指出,《甲寅月刊》是《新青年》出世之前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它是《青年》杂志的先声、雏形。陈独秀在经过东京《甲寅》的一段时间的锻炼准备之后,才独立地创办了《青年》杂志,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扬了这个杂志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克服其中一些弱

① 岳升阳:《〈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的理论准备》,《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又见刘桂生、朱育和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1页。

③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69页。

点和不足，进一步加强了刊物的批判性、战斗性。^①

随后，一些学者继续朝这一方向开掘。其中杨琥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初进步报刊与五四新思潮——对〈甲寅〉、〈新青年〉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0年）对《甲寅月刊》作者群的构成及其特征做了系统分析。其后来发表的《〈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和《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等文章均系在此文的基础上改就。此外，刘桂生的《章士钊与〈甲寅杂志〉和〈新青年〉》^②、闵锐武的《〈甲寅杂志〉与〈青年杂志〉的渊源关系》^③、庄森的《〈青年杂志〉相承〈甲寅〉论》^④等相继面世。至此，《甲寅月刊》与《新青年》存在前后继承关系，基本成为铁案。

此外，李怡的《〈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⑤、赵亚宏的《〈甲寅〉月刊与新文学的发生》^⑥专门探讨了《甲寅月刊》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关系。袁甜的《〈甲寅〉杂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中文系，2006年）以《甲寅月刊》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通讯”一栏中表现出的读编意图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了中国式启蒙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思维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无法回避的困境。陈友良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⑦则考察了《甲寅月刊》和《太平洋》杂志作者群留学英国这一共同求学经历，分析了其政治主张及思想资源。

①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

③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④ 《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⑤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⑥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甲寅日报》和《甲寅周刊》的研究还未真正展开,特别是《甲寅日报》,真正见到过这份报纸的人并不多。

本来,“甲寅派”因《甲寅》而得名,而《甲寅》有前后之分,且差别极大,当然“甲寅派”也应该有前后之别。但一般的文学史、思想文化史研究者未能对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甲寅派”这一概念是胡适 1922 年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1925 年梅子在《甲寅派思想的解剖》^①一文中也使用了“甲寅派”这一概念,但前者谈的是《甲寅月刊》时期的“甲寅派”,可以称之为前期“甲寅派”,后者论的是《甲寅周刊》时期的“甲寅派”,可以称之为后期“甲寅派”。在以后的历史、文学史著作中,人们更多的是以后期“甲寅派”来指称整个“甲寅派”。如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就把“甲寅派”视为一个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封建复古派别来进行批判,其实批判的只是后期“甲寅派”。^②由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③一书,收有鲍晶和郭武群撰写的《“甲寅”派》一节;该节对“甲寅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主将章士钊及其他成员的文学主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述,但书中所谈的“甲寅派”,也只是后期“甲寅派”,而非整个“甲寅派”。

近年随着章士钊研究的加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甲寅派”,但对“甲寅派”前后不分的局面仍没有改变。如刘长华在《甲寅派文学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和当下意义》(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 年)一文中认为,“甲寅派”的文学价值观包括文学的价

① 《世界日报·学库》1925 年 9 月 19—21 日。按:这里的梅子应该是《世界日报·学库》主编万枚子的笔名。万枚子(1905—2005),湖北潜江人。1925 年北京大学肄业后投身新闻事业,历任北京《世界日报》编辑,北京《民立晚报》、天津《民主晚报》、开封《革命军人朝报》、《北平朝报》总编等。参见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1—182 页。

③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